

今本《文子》“老子曰”探疑

王 三 峡

“老子曰”在今本《文子》中共出现一百八十五次，除少数出现在问答部分外，一般都冠于一章之首。这一点，很多人都提出过疑问。章太炎说：“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①张成秋说：“其文皆称‘老子曰’，然不尽老子言也。”^②由“老子曰”的可疑，推论《文子》为伪书。

对于这些指责，认为《文子》是先秦古籍的学者们在论述中通常都是置之不理，因而就使他们的论述欠缺说服力。偶尔也有个别人予以解释，以为文子谦让，故托之以其师老子曰，但从情理上讲却难通。一本题名为《文子》的书，“文子曰”只出现过三次，而“文子问”却出现了十四次。似乎书中文子的存在只是为了提问，为了其师的思想得以阐述而设的。诸子书好托为问答，但书名著者只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的书，却是不曾见过。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斥《文子》为伪书的学者们的眼力。不同的是由此而推出的结论。伪书说的学者们从“老子曰”的可疑，得出《文子》是伪书的结论，我们则认为，这只能证明《文子》在某些方面可能被伪纂，而《文子》基本还是一部先秦古籍。幸好出土竹简解开了这个疑团。

1973 年，在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中发现了《文子》竹简。《定县 40 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

从几个与今本相同的章节证明，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答问的先生变成了提问的学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个老子。如简文“平王曰：王者几道乎？文子曰：王者一道而已。平王曰：古者有以道王者……”有如“平王曰：何谓圣智？文子曰：闻而知……”今本改作“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两相比较，其窜改的痕迹便一目了然。这就使《文子》得以部分地恢复其本来面目，证明《文子》本非伪本，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③

冠于章首的“老子曰”何时出现的呢？

今日所见《文子》，除竹简本外，最早的要算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文子》诸写本残卷。《文子》敦煌写本段首亦多冠以“老子曰”。据《敦煌宝藏》^④所载：

编号 p2456 题名《文子·道元第一》有：“老子曰：道者虚无平易……”

《文子·九守第三》有：“老子曰：天地未形……”

编号 p3768 题名《文子·道德第五》有：“老子曰：执一世之法籍……”

编号 p2810 题名《文子·下德第九》有：“老子曰：衡之于左右……”

这些“老子曰”出现的地方，均同于今本，位于今本章首位置。编号 p3768 卷末，标有校定日期“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其他诸写本大约也抄写于前后时期。据此可知，最迟，唐天宝十载（752），《文子》已同于今本，章首多冠以“老子曰”。

此前，唐贞观（627～649）年间，由魏征、虞世南等奉敕编纂的《群书治要》，收有《文子》四十五条，自章首提行另起的，并未见冠以“老子曰”字样。如《精诚》篇“冬日之阳”章、“心之精”章。

章首的“老子曰”会不会是贞观至天宝的一百多年间加入的呢？

《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

其年（天宝元年）五月，宰臣奏：“两京及诸郡崇玄学生，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举人，合习《道德》、《南华》、《通玄》、《冲虚》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请条补，崇玄学生亦合习读。其《洞灵真经》，人间少本，臣近令诸观寺寻访，道士全无习者。本既未广，业实难成，并《通玄》、《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阙，学者宜精其《洞灵》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及两京崇玄学生，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玄学生望且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诏条考试。其《洞灵真经》等，请待业成后准试。”从之。

朱大星先生据此认为：“在唐玄宗天宝元年之前，《文子》还没有比较完善的定本。大概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或稍晚，整理出了比较完善的《文子》定本，让广大道徒习诵；为了表示对李氏先祖老子的尊崇，因而在定本《文子》中加进了许多‘老子曰’。从上述情况看，唐代可能是《文子》一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并且那个大约在唐代整理出来的《文子》定本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十二卷本《文子》雏形。”^⑤

然而，唐代被人称为“书簏”的李善注《文选》，曾引《文子》一百二十九条（其中数条重复出现），这些在今本《文子》中都能见到，个别地方有字词出入。值得注意的是李善注引文的体例。

张华《鹤鹑赋》：“阴阳陶烝，万品一匹。”李善注曰：“《文子》老子曰：阴阳陶冶万物。”（见今本《文子·下德》）

张华《女史箴》：“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

有固然。”李善注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极即反，盈即损，日月是也。”（见今本《文子·九守》）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李善注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见今本《文子·道德》，《老子》二十九章）

干令升《晋纪总论》：“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李善注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见今本《文子·道德》，《老子》二十九章、六十四章）

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遭时难；遭时不难，遇君难。”李善注曰：“《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化所以千载不一也。”（见今本《文子·下德》。“至化”，本作“至治”，避高宗李治名讳而改）

上五则引文，悉题为“《文子》老子曰”。但第一、二、五则引文并不见于今本《老子》，而在今本《文子》中，均处于一章之首，紧承“老子曰”之下，故而题为“《文子》老子曰”。三、四两条引文实际是一条，在今本《文子》中，虽非章首，但为老子答文子语，亦见于传世本《老子》，故亦题为“《文子》老子曰”。

此外的一百二十四条引文，章首多有“老子曰”，但因引文并非紧承“老子曰”之下，又非老子答文子语，故李善注均题为“《文子》曰”。

从李善注的引文体例可以看出，李善见到的《文子》已与今本相同。李善（约630～689）生当初唐，其卒年距天宝元年尚早五十余年，显然，“老子曰”并非加于天宝年间。朱大星谓天宝年间整理出《文子》定本，或为事实，然谓“老子曰”加于此时，则失于深考。

另外，能印证“老子曰”并非加于天宝年间的还有唐高宗章

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李贤在《后汉书·班固传》^⑥注释中引到：

老子曰：“执玄德于心，化驰如神。”

老子曰：“和阴阳，节四时，润乎草木，浸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

传世本《老子》不见这两条文字，均出于今本《文子·道原》篇。可见《文子》中居于章首的“老子曰”早在唐高宗时期就已存在，而当时太子李贤就是将其后的文字认定为老子语。

《隋书·经籍志》约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李善《文选注》、李贤《后汉书注》与《隋书》成书时间相差不远，《隋书·经籍志》记载的《文子》已是十二卷，章首想必已冠以“老子曰”，与今本大致相同。

稍前编纂的类书《群书治要》所引《文子》全见于今本，篇数、篇名已与今本相同，引文前并未冠以“老子曰”，或当另寻解释。也许存在这种可能，就是《文子》章首虽已冠有“老子曰”字样，但编纂者很清楚不是《老子》中的文字，编纂时将其去掉，只要所选内容精彩深刻、富有哲理，大可不必理睬挂于谁的名下。当然，也可能因为所选内容并不都是紧承“老子曰”之后，如冠以“老子曰”，其间尚有许多未选文字，在行文上有诸多不便，故而一律去掉，这种解释也是合情理的。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隋代的《文子》章首已冠以“老子曰”。

魏晋南北朝期间尚未发现引《文子》文字而称为“老子曰”的现象，不过，却有用《文子》中文字而称“黄帝之言”的。东晋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糜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⑦见于今本《文子·九守》篇。

何志华先生发现高诱《吕氏春秋》注中，有两则“老子”引文，实际是出自《文子》的：^⑧

《吕氏春秋·勿躬》：“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高诱注曰：“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谓也。”

今本《老子》未有此文，而见于《文子·微明》第一章：

老子曰：……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

高诱又注释过《淮南子》。《淮南子·道应训》也有这两句，不过，整节文字引自《庄子·知北游》，而作“太清”之语。高诱未引作“《庄子》曰”，也未引作“太清曰”，却引作“老子曰”，可见高诱确实见过章首冠以“老子曰”形式的《文子》，而且，他是相信《文子》中的“老子曰”的。

《吕氏春秋·本生》：“今有声于此……必弗食。”高诱注曰：“……老子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味实口，使口爽伤也。’”

同篇“烂肠之食”句后，高诱注曰：“老子曰：‘五味实口，使口爽伤’，故谓之烂肠之食。”这两处所引“老子曰”，见于《文子·九守》第二章：

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音乱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生创；趋舍滑心，使行飞扬。

章首照例冠有“老子曰”。上述这些引用《文子》文句却称为“老子曰”的现象，确实说明，《文子》在东汉时代就有冠于章首的“老子曰”形式存在。

由于高诱曾注释过《淮南子》，这三处保留在《吕氏春秋注》中的引《文子》文字却称为“老子曰”的资料，更显得意义重大。此前，人们也发现高诱在《淮南子》注释中所用释语与今本《文子》往往相同，举以证《淮南子》抄引《文子》文句而随意改易，高诱注释用《文子》文字予以诠释、补充或纠正，但是都被斥《文子》是伪书的学者们说成是今本《文子》抄袭高诱注释改《淮南子》文字。如今，有了高诱《吕氏春秋注》中的三条引自《文

子》却称“老子曰”的例证，可以肯定地说，高诱在注释《淮南子》时曾参考过《文子》。这些被高诱注释充分重视并加以利用的文字，如今都保留在今本《文子》中。高诱可以说是比较研究《文子》与《淮南子》的第一人。高诱是不是第一个发现《文子》与《淮南子》有大量相同语句的学者呢？目前还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高诱知道《淮南子》所本是《文子》。当然，高诱在注释中遇到《文子》与《淮南子》文字有差异时，也不都是以《文子》为正，有时刻于水平，强行为《淮南子》说解，甚至就误而注，这些毛病被清代小学家王念孙一一摘发。^⑨

不过，在另一些《吕氏春秋》文字也同于今本《文子》的地方，高诱注释并没有指出“老子曰”，如《吕氏春秋·君守》：“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二语又见《文子·上仁》篇，《淮南子·主术训》。这让我们猜想，当时在章首冠以“老子曰”的可能只是部分章节，没有后来这样多。

班固、王充见到的《文子》与此应该大致相同，如果他们见到的本子和竹简本一样，通篇都是“平王问”“文子曰”，那么，班固、王充凭什么认为文子是老子弟子呢？或许今本中的“吾闻子得道于老聃”这句话^⑩，在班固时代就已有了。

王利器先生就发现汉代有“虽用《文子》之文，却不道《文子》之名，而直称为黄帝曰或老子曰者。”^⑪

昭帝元始六年（前 81 年），召开了盐铁会议，以儒道学者为主的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关于对匈奴战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贤良文学引用老子语批评武帝时的长期战争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民不聊生，其中既有见于传世本《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也有明称“老子曰”而不见于传世本《老子》的文字。

《盐铁论·本议篇》：“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燥也。’”

传世本《老子》无其文，亦不见于帛书和楚简《老子》，而是

见于今本《文子·自然》第五章：

老子曰：……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而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鲜而费多也。

王利器先生认为，此当为《盐铁论》之所本。虽引文与《文子》并不全同，但称“老子曰”，则与今本体例相近。或许汉时人真是将其视为老子语也未可知。《文子》在“虚者”之后，是对前四句分别阐述，颇具训释特色。这与《文子》中其他地方训释《老子》语的形式相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盐铁会议的时间，公元前81年，而竹简《文子》的入葬时间是在公元前55年，也就是说，这条引《文子》文字却称为“老子曰”的资料出现时间比竹简入葬年代要早26年。

刘向（前77～前6）在元帝、成帝时代曾受诏校理群书，每整理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②刘歆（？～23）继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承《七略》而来，《艺文志》中关于《文子》的记载可能也是承《七略》而来。《盐铁论·本议》篇的“老子曰”早于班固之时一百多年，可以设想，班固《艺文志》记载的九篇本《文子》中，部分章首原是存在“老子曰”的。

如果九篇本《文子》中原本就存在“老子曰”，那么，这些“老子曰”又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书中的呢？我以为，与儒家典籍中众多的“子曰”、黄帝书中众多的“黄帝之言”、农家著作中的“神农之言”出现在同一时期。

马骥曰：“《文子》，《道德》之义疏，语必称‘老子’，尊所闻以立言也。”^③“老子曰”的出现，正与儒家典籍中众多的“子曰”、“孔子曰”一样，为弟子后学记录、转述师言，只是因孔子

“述而不作”，并无专著可核对比勘，其学派传承相对较清楚，我们无法知其是否依托。老子如真有弟子后学，完全可能以“老子曰”的形式记录或转述师言。推想老子平生，决不会仅有“五千言”。“老子曰”之后，或许还真保留有老子遗说。

王利器先生倡“两个老子说”：“必须了然于此，认识到在黄老之学崛起和发展过程中，出现有两个老子，一为关尹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一则为黄老学者所依托之老子，然后去读《老子》、读《文子》、读《淮南子》，庶几大通无碍，毫发无遗憾也。”^⑭王先生其实是说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部分引述老子语，部分为黄老学者的依托，恰如众多黄学著作中所称“黄帝之言”一样，今世学者不可过于拘泥胶着，更不可因“老子曰”来斥《文子》为伪书。

会不会有本是《文子》文句，因托名“老子曰”，而早已进入传世本《老子》中并未被察觉呢？这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留待以后探讨。

此外，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的“老子曰”，那就是魏晋以后窜入的“老子曰”。这种情况应该与《文子》由九篇一变为十卷、再变为十二卷同步，与此同时改变的应该还有《文子》中问答部分的主客体，“平王问”、“文子曰”被替换为“文子问”、“老子曰”。

伪纂者是出于什么心理在《文子》中窜入“老子曰”的呢？

一、从社会思想方面来考虑，魏晋以后，玄学盛行，《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为士人推崇，而同是道家著作的《文子》则屡遭散乱。伪纂者冠之以“老子曰”，可能是希望借此抬高《文子》的地位，使《文子》像《老子》、《庄子》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至少不至于散失。

二、从《文子》本身的体例来看，汉代就有在章首冠以“老子曰”的情况，为统一体例，干脆以“老子曰”作为分章的标记。

同时改变的应该还有问答部分的主客体，也可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当然，问答主客体的改变或许还因为班固的“似依托”之说。伪纂者为了消除“依托”嫌疑，改为了“文子问”、“老子曰”，成为师生之间的问答，何况本来就有文子是老子弟子的说法。

至于伪纂者是谁，我以为与将《文子》整理成为十卷或十二卷的可能是同一人。现在有两个人颇有嫌疑，一个是曾注释过《列子》的张湛，一个是元魏人李暹。李善《文选注》引录了张湛《文子注》数条资料。如：

《奏弹曹景宗文注》：“《文子》曰：‘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张湛曰：‘日有千金之费’。”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文子》曰：‘群臣辐辏。’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也’。”

《游仙诗注》：“《文子》曰：‘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上与道为友，下与化为人。’张湛注曰：‘上能友于道。友或作反。’”

看来，张湛确实注释过《文子》。章炳麟据此推论说：“今本疑为张湛伪造，与《列子》同出一手也。”^⑩张湛其人，又注释过《列子》与《庄子》。《庄子注》早已亡佚，《文子注》也仅保留了几条，《列子注》虽存于世，《列子》书却有“伪书”之嫌疑，张湛又被认作是伪造《列子》之人。不过在笔者看来，《列子》不是伪书，张湛也没有伪造《列子》，最多做过一些整理工作。

我们虽不同意是张湛伪造《文子》，但如说是张湛在注释过程中对散乱后的《文子》做过一些整理工作，还是有可能的。第三条张湛注“上能友于道。友或作反”，特别引起我们注意。张湛不仅解释了“上与道为友”，而且还保留了一条异文“友或作反”。这条异文对今本《文子》文字上的订正并没有多大价值，不过却说明了两点：第一、张湛至少见过两种《文子》；第二、张湛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由此推想，张湛也许不会任意添加“老子曰”，张

湛注释过的本子如果有“老子曰”，那也应该是前代保留下来的，添加“老子曰”的应另有其人。张湛也可能将散乱后的两种本子加以拼合补正，部分无法恢复原貌的地方，或一仍其旧，或取他书补齐弥合。张湛注唐代尚存，不知李善见到的是全本还是残篇。

《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文子》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文子》十二卷，徐灵府注《文子》十二卷，李暹训注《文子》十二卷。”又《宋史·艺文志》记载：“李暹训注《文子》十二卷，朱弁《文子》注十二卷，”徐灵府注今存，李暹注与朱弁注宋时尚存。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惟中有汉后字面，而篇数屡增，则或李暹辈润益于散乱之后欤？”关于李暹，多以为元魏人，惟罗峻《诸子学述》以为李暹是唐代人。如是唐代人，那么在《文子》中添加“老子曰”的就不可能是他。要弄清伪纂者是谁，还有赖于材料的发现。

“老子曰”可能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进入《文子》中的。一在班固之前，不排除最初原始本子中就有的可能。一在魏晋以后。“老子曰”可以分为几种情形：（1）引述老子言见于今本《老子》的；（2）弟子后学记录或转述师言的；（3）黄老学者依托“老子”而立言的；（4）魏晋后窜入的“老子曰”。后三种，今日已无法分清，仍有赖于材料发现。

至于今本《文子》中出现的一百八十五次“老子曰”，是否都如《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所说“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反过来，当把所有的“老子曰”都改为“文子曰”呢？这样也不妥。

今本《文子》中，文子与老子问答的段落共十四章：《道德》八章，《上仁》三章，《微明》两章，《上义》一章，按竹简简介所说，都当为平王与文子的问答。此外的一百七十一“老子曰”，固然多数都是伪纂者冠于章首的，当改成“文子曰”，但其中很多地方确实是老子语，见于传世本《老子》。据丁原植教授统计^⑩，今

本《文子》共引用了《老子》文字五十一章。这类“老子曰”是不好全用“文子曰”来替换的。即如首篇《道原》第一章的“老子曰”，就很难替换。《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无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闻其声。吾强为之名，字之曰道。……

所引老子语，见于《老子》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文子》所引与传世本《老子》文字显然有较大出入，与帛书《老子》甲、乙本也不尽相同。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窈窈冥冥’似已吸收帛书《道原》‘混混梦梦’语意。”^⑩这也是《文子》的特点之一，引用《老子》文句，但并不原原本本照搬，而是结合新的时代，加进了不少本学派新的理论探讨。这种修补改造后的文字，如果章首冠以“文子曰”，则明摆为“剽窃”；冠以“老子曰”，又有“怪异”之感。两难之中，宁取“怪异”，不取“剽窃”。所以，竹简《文子》虽然未见有“老子曰”，但古本《文子》中未必没有“老子曰”^⑪。

李零先生在谈论古书形成时曾很有见地地指出：“先秦古书也像后世文集，往往是由后人收集整理而成。但这个过程还要复杂得多。古书从思想酝酿，到口授笔录，到整齐章句，到分篇定名，到结集成书，是一个长过程。它是在学派内部的传习过程中经众人之手陆续完成，往往因所闻所录各异，加以整理方式的不同，形成各种传本，有时还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笔记、注释、学案、传状），老师的东西和学生的东西并不能分得那么清楚。”^⑫《文子》的形成大约也是如此。持此观点看待《文子》，很多理不清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注：

- ①⑮章太炎：《蓟汉微言》。
- ②张成秋：《先秦道家思想研究》。
- ③《文物》1981年第8期。
- ④《敦煌宝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 ⑤朱大星：《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文献》2001年4月第2期，202页。
- ⑥《后汉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1372页、1381页。
- ⑦《弘明集》卷五。
- ⑧何志华：《出土文子新证》，香港《人文中国学报》1998年，174~175页。
- ⑨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
- ⑩今本《文子·道德》篇，对应竹简中没有这句话。
- ⑪⑭王利器：《文子疏义序》。
- ⑫《汉书·艺文志》。
- ⑬马骕：《绎史》八三。
- ⑯丁原植：《文子新论》。
- ⑰李学勤：《帛书〈道原〉研究》，载《古文献论丛》第163~16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版。
- ⑱关于今本《文子》与竹简本《文子》、九篇本《文子》的关系，将在《竹简〈文子〉新探》中讨论，待刊。
- ⑲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再认识》，载《九州学刊》3.1（1988）。

作者工作单位：荆州师范学院中文系